

面向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与社工行动

谢治菊 梁英华

摘要: 帮扶干部在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帮扶干部及其家庭也面临多重压力,应受到重视与关注。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现实、理论与政策三个层面分析和提出帮扶干部需要情感支持的原因,并结合深度访谈资料,从工作、生活、家庭三方面分析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表征。而后,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帮扶干部情感支持的优势与策略,发现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支持的过程中,除满足情感需求外,还能有效实现帮扶干部以“个人、集体、国家”为核心的情感互动,促进情感激励,实现情感反哺。由此,精准把握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积极采取以情感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社工行动,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强化社会支持、完善政策体系,是社会工作者调适帮扶干部情感问题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 帮扶干部; 情感支持; 社工行动; 乡村全面振兴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2.010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①“尽锐出战”的主角,指的是脱贫攻坚时期全国累计选派的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以及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②,这些干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脱贫攻坚时期,他们与贫困群众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以确保实现贫困群众“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为使命,以帮助贫困群众彻底摆脱贫困为目标,齐心协力、顽强奋战、呕心沥血,更有1800多名牺牲在脱贫攻坚路上。事实上,干部参与到帮扶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作为外部强制性嵌入力量,帮扶工作队真正融入地方关系网络是有难度的,且部分干部由于适应能力较弱,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③;同时,由于帮扶干部管理机制如激励机制、监管机制、考评机制、容错机制等仍在完善中,对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④。此外,帮扶干部长时间离开原工作单位和家庭,容易导致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冲突,进一步影响其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⑤。

的确,帮扶干部在开展帮扶工作的同时,其个人与家庭或多或少也会面临一些“被帮扶”的需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就个体而言,由于帮扶干部处于压力较大的工作环境中,部分人员会出现身心健康不佳、工作热情减退、个人成就感和价值感降低等问题;就家庭而言,由于大多数帮扶干部是跨地开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和帮扶路径研究”(22&ZD192)。

作者简介: 谢治菊,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广州 510006; 1045150178@qq.com);梁英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 511370; 419658846@qq.com)。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日报》2021年4月7日,第9版。

③ 谢治菊、黎明霖:《共同富裕视域下的整域性帮扶与整体性治理——驻镇帮镇扶村的一个解释框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④ 罗兴佐:《完善驻村干部制度助推乡村振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 周永康:《驻村干部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支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帮扶,高强度的工作以及长时间的异地分居,会产生家人缺乏照顾、类单亲家庭、家庭关系紧张等问题。个人与家庭问题会进一步加重帮扶干部的身心压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帮扶干部自己也需要别人“帮扶”。另一方面,学界对此也缺乏研究。目前,学界对帮扶干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帮扶机制^①、影响因素^②、帮扶成效^③、帮扶关系^④等方面,鲜有涉及帮扶干部本身的情感需求与社会支持方面。此外,与普通干部相比,帮扶干部比较特殊,他们在受扶地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十分关键。尤其是人情、面子、伦理等要素在“乡土性”解构与“现代性”建构并存的转型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研究帮扶干部这一群体时,还需要借助情感技巧对其“工作”“生活”进行改造,使情感要素在他们所处的“新主体陌生人”社会中发挥作用。

实际上,政府和社会已关注到帮扶干部所面临的这些压力,并提出从制度路径^⑤、技术路径^⑥、情感路径^⑦去舒缓干部的压力。虽然以上三种路径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帮扶干部的需求,但针对这几方面的社会工作路径研究较少。可以说,社会工作者除了提供物质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为服务对象提供情感支持。当然,情感本身的确认,取决于文化模式、社会规范、互动情境、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的交互作用,是难以捉摸的^⑧。然而在现实中,政府对这方面的介入通常诉诸行政手段,缺乏柔性的方式去满足干部情感方面的需求。不过,在讨论中国的治理体系时是要关注情感层面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兴起的一个重要特点^⑨。由于治理的对象往往是人,而人是具有情感的,帮扶干部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国对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同样需要引起重视,毕竟情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持久联系以及人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关联,在社会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⑩。因此,无论是政府介入的行政手段还是其他的柔性手段,对帮扶干部的支持都离不开情感的范畴,这就催生了情感治理的维度,形成了治理中情感的回归路径,即“构筑情感的治理面向,扩展情感治理空间,形成更加合法的治理手段与更为正当的治理模式”^⑪。而且,在社会工作领域,情感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其中关系强度是情感支持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是情感支持的基础要素^⑫。再加之,社会工作本身具有情感支持功能,一方面,社会工作是一项特殊的情感劳动,情感投入越真实,情感劳动的价值就越大;情感投入的受益程度越大,情感劳动的价值就越大^⑬;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是全程的情感劳动,通用模式的五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支持。简言之,社会工作参与到情感治理中,可在宏观干预和调节、微观情感和人心调适方面提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术^⑭,也可以促进个人、家庭、社会中的情感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⑮。亦即,社会工作手段的介入能有效缓解帮扶干部的多重压力,对他们进行情感支持。不过,已有的社会工作实践较多集中在相对弱势群体,如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妇女等群体,对帮

① 王晓宾、马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组团帮扶机制研究——以粤东J县驻镇帮扶工作队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

② 童春阳、周扬:《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张欢:《驻村帮扶中的权力替代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 向德平、向凯:《情感治理:驻村帮扶如何连接国家与社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 张晓磊、杨术:《干部挂职锻炼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⑥ 雷震、王驰:《乡村振兴视阈下帮扶干部担当作为的困境与突破》,《农业经济》2022年第11期。

⑦ 刘金凤:《领导干部面对政治压力心理扭曲的表现与矫正之策》,《领导科学》2020年第15期。

⑧ 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⑨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⑩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⑪ 马超峰、薛美琴:《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回归与张力调适》,《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

⑫ 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⑬ 郭景萍:《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情感劳动的探讨》,《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⑭ 卫小将:《社会工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⑮ 任文启、顾东辉:《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扶干部的介入和支持较少,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探索空间。

一般而言,帮扶可分为政府帮扶与社会帮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帮扶,都是结对帮扶的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地方以及地方内部之间的帮扶,呈现出如对口支援、对口合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省内结对帮扶、东西部协作等形式。本文所探讨的帮扶干部,是指在结对帮扶中,按照选派要求和选派流程,由发达地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到欠发达地区开展帮扶活动的人员统称。为深入了解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及社会工作介入路径,课题组于2019年2月到2023年2月,对G省、Y省、S省等全国7省285名帮扶干部及在地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的帮扶干部包括:一是从帮扶类型来看,有东西部协作干部、对口支援干部、省内结对帮扶干部、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干部;二是从帮扶干部级别来看,有厅级干部、县处级干部、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三是从帮扶领域来看,几乎关涉所有的涉农部门;四是从帮扶干部的派出单位来看,有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这些帮扶干部中,男女干部占比分别是89.1%和10.9%,汉族占86%;平均年龄为43岁,比较年轻;学历以本科以上为主,占93%,整体文化程度较高。重要访谈对象列表详见表1^①。

表1 重要访谈对象列表

访谈日期	受访者编号	性别	民族	年龄	学历	政治面貌	职位	所属地
20230212	CJY	男	汉族	37	本科	党员	挂职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G省G县
20230216	GKY	男	汉族	44	本科	党员	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G省Z县
20220731	FJY	男	汉族	43	本科	党员	市乡村振兴局科长	G省A市
20220731	FXQ	男	汉族	50	研究生	党员	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G省Z县
20220801	ZJQ	男	汉族	26	本科	党员	驻村干部	G省G县
20220802	LXT	男	汉族	51	本科	党员	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G省Z县
20220803	HBT	女	汉族	35	研究生	党员	挂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G省A市

本文围绕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展开。情感支持的缘由即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如图1所示,有两方面激发了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一方面是帮扶干部意识到自身情感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支持,另一方面是关爱政策供给的不足。本文拟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来支撑社工行动的介入。所谓社会支持网络,是指由个人之间的接触所构成的关系网,通过这些接触(关系网),个人得以维持其身份,并获得情绪、物质、服务、信息的支持。同时,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其基本假设有六个方面:一是人类的生存需要与他人合作,并且依赖他人从而获得协助;二是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事件发生;三是人们在遭遇一些事件时,需要自身资源以及外部资源的支持;四是当人们遭遇事件处于压力之下时,社会支持网络能够缓解负面的压力;五是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六是社会中的困难群体需要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社会支持功能。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物质援助、情感慰藉、心理疏导、关系支持^②。因此,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来支撑社工行动的介入,能让帮扶干部在工作方面得到情绪缓解、在生活方面重新重视情感的作用、在家庭方面做到真正的情感回归。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者进一步深度介入帮扶干部在“个人、集体、国家”中所产生的情感互动,促使情感成为一种激励手段,让帮扶干部更积极地投入工作中。此种转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是使之成为帮扶干部工作动力的来源;二是使之成为帮扶干部之间或帮扶干部与群众、受

① 表1里面,主要是本文引用的重要受访人员。同时由于受访人员平均年龄为43岁,在部分受访人员中会透露自己的子女信息,本文也利用了这些信息进行分析。

② 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扶地之间的情感链接。简言之,通过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一方面能够对现有关爱政策在情感关爱方面进行补充,另一方面能有效满足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从而实现对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由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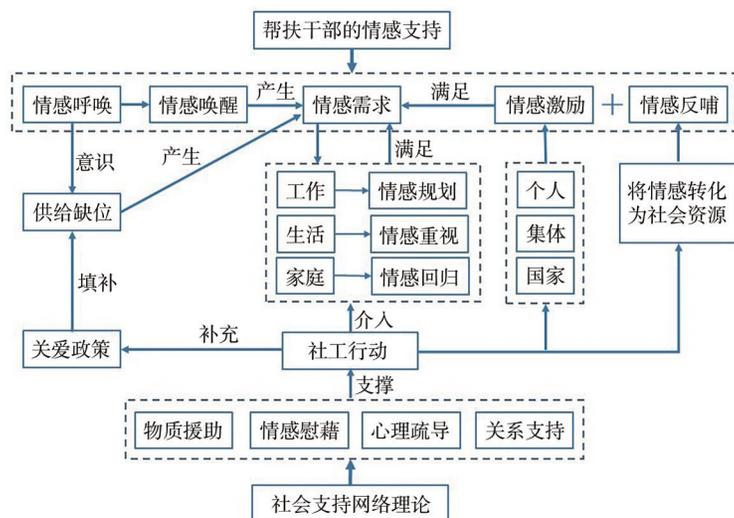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面向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调查与分析

情感需求是新时代员工行为选择的重要驱动力,影响着员工的情绪状态和工作积极性,组织能否满足员工的情感需求,关乎政策与决策的实践效果^①。这说明情感要素是组织管理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需要在了解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前提下,通过更具温度和贴切的方式,来达致对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通过对调研素材的分析,本文将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来自工作方面的情感需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当下,帮扶干部的工作压力有增无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②可见乡村振兴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它给帮扶干部带来的压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位晋升方面的压力。美国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肯珀(T. D. Kemper)指出,权力地位与结构情感的关系是:当人们对权力地位关系状况满意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或肯定的情感,否则会产生消极的情感^③。的确,权力与地位的改变,所产生的情感效应也是相对的。例如,有些干部表示,本来不想到受扶地挂职,可是单位必须安排人员,只能服从安排;也有些干部认为到了受扶地挂职,虽然晋升时会被优先考虑,但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同样,帮扶到期回原单位后,干部职位得到了晋升,可是晋升的职位与能力、期望也许不相符,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工作任务完成不好等问题,给干部带来一定的精神压力与心理负担;也有些干部职位晋升了,如四级调研员升为三级调研员,但这种类型的晋升对干部没有实质作用。而得不到升迁的帮扶干部,认为是政策支持不足,如Q州D

① 胡秀洁:《单位人才培养中的情感要素及其融入策略》,《领导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23页。

③ 冯冬燕:《肯珀情感的社会互动理论的述评》,《心理科学》1999年第3期。

县乡村振兴局挂职副局长^①访谈时提道：“文件上提到优先考虑晋升，原本想着会重(zhong)用，但回到原单位又变回了重(chong)用，缘于政策上没有明确说明一定会晋升。”这难免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从而产生消极的情感，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考核方面的压力。访谈时某市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科科长^②谈道：“每年接受4项国家考核，包括后评估、资金绩效评价、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的考核^③，还有省级层面的考核，比如东西部协作就需要接受本省和帮扶省2次省级考核。特别是整改这一块，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位干部除了常态化工作以外，剩下的基本就是与考核相关的工作。”可见，在迎接考核与整改考核问题方面，任务量比较大。三是结对关系调整的压力。2021年年初，由于结对帮扶关系的调整，之前帮扶A市的Q省如今换为G省。帮扶关系的转变，使得帮扶干部产生不适应。为此，一名在Z县挂职的副县长^④讲道：“以前Q省帮扶这里20多年，当时的管理模式、结对方式以及结对帮扶干部的运作模式与现在的要求都不同。我们刚刚来，压力很大。”同时，调研发现，东西部干部对发展的理解与行动方式是不同的：西部习惯用行政化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东部则是习惯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这造成帮扶干部与当地干部在工作上会出现一些分歧，也是帮扶干部压力来源之一。研究表明，由于员工将他们的身体、认知和情感能量投入其工作角色之中，促使其在更长的时间内以更高的强度完成任务，因此，他们应该展现出更强的能力，以及更关注和专注于责任，在情感上与构成他们角色的任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⑤。亦即，在时间紧急、环境陌生、任务繁重等多重压力下，帮扶干部在情感上容易出现需求。

第二类是来自生活方面的情感需求。生活方面的情感需求是指帮扶干部在受扶地因身体、心理、语言、思维、文化等方面的不适应而产生的需求。有学者在对612名基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中发现，生活上的压力仅次于工作上的压力^⑥。的确，帮扶干部来到陌生的地方工作，生活上的不适会从身体和心理上反映出来。首先，语言不流畅导致沟通压力。例如，在东西部协作过程中，帮扶干部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沟通交流成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可是，语言有时候会形成一种隔膜。“语言不通是一种障碍，有时听不懂当地干部在交流什么，有种被排斥的感觉。”一位挂职干部^⑦如是说。这种被排斥的感觉会对帮扶干部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人类文化的建构和传承都依赖于语言^⑧。因此，语言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上的差异，导致部分帮扶干部出现心理排斥状况，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交往压力。其次，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一是饮食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与受扶地的饮食习惯不同，由此引发的身体上的不适会慢慢转变为心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大。二是地理气候方面，东部沿海多属于平原地区，而受扶地多为海拔较高的西部，地理气候的改变给帮扶干部带来生活上的压力，如在B市J县挂职的副县长^⑨告诉我们：“由于身处高原地区，每天晚上难以入睡，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工作压力大，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最后，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生活上的压力。在当代社会，文化已构成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不同分布和社会配置深刻地

① 男,37岁,汉族,本科,乡村振兴局挂职副局长,访谈时间:2023年2月12日。

② 男,43岁,汉族,本科,某市乡村振兴局科长,访谈时间:2022年7月31日。

③ 注:这四项考核同在后评估考核组进行,不过,是不同的考核主体来考核,同一个县最多被抽中两次考核。这是2024年之前的说法。

④ 男,50岁,汉族,研究生,挂职副县长,访谈时间:2022年7月31日。

⑤ Rich B. L., Lpinc J. A., Crawford E. R., "Job Engagement: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n Job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3), pp. 617-635.

⑥ 李景平、江和原:《何以解压:心理韧性视角下基层领导干部抗压能力提升研究》,《科学决策》2021年第11期。

⑦ 男,26岁,汉族,本科,挂职某县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访谈时间:2022年8月1日。

⑧ 李荣启:《语言文化遗产的性质、现状与保护》,《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⑨ 男,44岁,汉族,本科,挂职副县长,访谈时间:2023年2月16日。

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和社会化过程,成为扩大个人和群体间差别的重要社会结构性因素^①。也就是说,帮扶干部从原单位所在地区来到受扶地,由于两地文化资源分布不一致而出现文化差异,会给帮扶干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适应,也会导致帮扶干部产生身心压力。

第三类是来自家庭方面的情感需求。作为一种社会单位,传统家庭有其自身的功能,如生产、消费和情感的满足等,确保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安宁,社会也相对得以稳定^②。的确,家庭是千千万万个小的生产单位和社会基础细胞,它牵动着每个人的个人情感、民族文化感情和经济利害关系^③。同时,家庭是帮扶干部的重要后方,后方不稳,势必会造成前方的担忧。故而,处理好家庭方面的压力,是帮扶干部安心工作的保障。S市N县一位挂职副县长^④向我们倾诉:“本来我的挂职年限就快到期了,但为了工作的连贯性,组织将我的挂职年限延长了1年。我平均每月回家1次,多数情况下是回到东部拉项目或洽谈合作时顺便回家,而最长是三个月才回家1次。”可见,帮扶工作会对干部的家庭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家里的老人没时间照顾,小孩教育与成长方面父亲或母亲是缺位的,形成了“类单亲家庭”。因此,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帮扶干部进行强制性休假,让他们有时间与家人、朋友等相聚,以缓解家庭生活方面的压力。还有一些帮扶干部表示接待、应酬都需要耗费较多时间,恰如一位市乡村振兴局的挂职干部^⑤所提道:“周末基本都需要接待参观、考察、调研的团队,忙得不可开交。”一些类似的事情占用了帮扶干部本该与家庭团聚的时间,慢慢削弱了帮扶干部与家人、朋友等的关系,逐渐弱化了他们原本的社会支持网络。恰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驻村干部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离开原工作单位和家庭,从而导致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并进一步影响其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进而影响驻村帮扶工作队伍的稳定性^⑥。诚然,帮扶干部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些贡献往往以牺牲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为代价。因此,适当缓解他们在家庭方面的压力,会让帮扶干部更安心地投入帮扶工作中,提升帮扶质量。

三、面向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政策供给及反思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对口合作为代表的对口帮扶力度的不断加大,干部挂职整体上呈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并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有生力量^⑦。结对帮扶不仅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阶段也是重要的助力。为坚持有序衔接、平稳过渡,“十四五”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强调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明确在严格落实脱贫地区“四个不摘”要求的基础上,合理调整选派范围,优化驻村力量,拓展工作内容,逐步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⑧。当面临与脱贫攻坚不一样的工作对象、工作范围、工作要求、工作手段时,乡村振兴阶段的帮扶干部压力更大,这一方面与压力型体制有关。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

① 郑杭生、杨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对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多视角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韩丽丽:《家庭问题与家庭社会工作的介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80页。

④ 男,51岁,汉族,本科,挂职副县长,访谈时间:2022年8月2日。

⑤ 女,35岁,汉族,研究生,挂职市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访谈时间:2022年8月3日。

⑥ 周永康:《驻村干部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支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⑦ 赵聚军、张哲浩:《干部挂职:基于政策目标变迁的“嵌入”问题三维呈现与发生机理》,《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8期。

⑧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5/11/content_5605841.htm, 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8日。

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方式和物质化评价体系。在压力型体制下,为获得资源,地方政府不得不“跑部钱进”,且为了在上级考核体系中取得好成绩,各级政府必然要对自己的部门和官员“加压驱动”^①。另一方面,建立在压力型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目标责任制”基础之上的运动式治理,在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效益的背景下,会产生治理过程的“棘轮效应”^②,促使治理走向“内卷化”,给基层带来巨大压力^③,这些压力会共同作用于普通干部与帮扶干部。但与普通干部相比,帮扶干部的压力还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帮扶干部一般是跨地域开展工作,身体、心理、语言、思维、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适应难以短时间内完成;二是帮扶干部的工作内容是组织安排的,大多数时候与之前的工作经历无关,不管其能力是否符合帮扶要求,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干出成效,以便迎接每年的“国考”和“省考”;三是帮扶干部要接受派出单位与受扶单位的双重考核,以及派出地、受扶地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组织部门的多重管理,工作要求相对较高,工作内容比较复杂。当然,帮扶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已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且出台了一些关爱政策予以缓解,这些政策对稳定帮扶干部队伍,缓解其压力、减轻其负担、保障其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爱主体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现有关爱政策包括对帮扶干部个人关爱和家庭关爱两大方面,不过关爱政策在个人与家庭两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从关爱主体来看,帮扶干部关爱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东部地区政府与西部地区政府,而有关帮扶干部家庭方面的关爱政策,只有帮扶干部家庭所在地政府制定。从政策内容来看,帮扶干部的关爱政策内容大致可分为个人待遇、提拔晋升、考核管理三大方面,三大方面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的项目,比如个人待遇包括工资福利、生活补贴(补助)、工作津贴、购买保险、探亲休假等;提拔晋升包括职称评定、优先考虑评先评优、职位晋升等方面;考核管理则与提拔晋升相呼应,对考核较好的进行表彰,考核结果成为帮扶干部提拔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有关家庭方面的关爱政策内容,根据不同的地区可分为10—20条,如表2所示,包括送菜上门、家居保洁、长者照顾、母婴服务等。工会、团委、妇联属于社会团体,然而社会团体只是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诸如企业、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没能有效参与进来。

第二,关爱内容以物质为主,精神层面关涉较少。分析关爱政策不难发现,大部分注重的是物质关怀,如Q州组织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干部人才保障工作的通知》,从组织保障、基本保障、工作保障三方面保障帮扶干部的生活与工作,其中组织保障方面主要是协助帮扶干部在受援单位任职;基本保障方面包括住房保障、经费保障、用车保障以及办公场地保障;工作保障方面规定“各县(市)、州直有关部门要明确1名熟悉情况的领导班子成员作为挂职干部人才的帮带联系人,主动帮助挂职干部尽快融入、投入工作,确保挂职干部人才顺利工作。”这些规定为帮扶干部尽快融入新环境提供了支撑。虽然有了物质上的保障,但帮扶干部容易出现隐蔽性更强的身心健康问题。分析发现,来自帮扶单位的关心与关怀、同事与群众的肯定、对个人与家庭的慰问、表彰大会上获得的赞誉与荣誉等,都成为帮扶干部工作动力的不竭来源。如G市帮扶工作组2023年的工作总结显示:S市共有25名党政干部获得提拔重用,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干部人才135人次,其中,7名干部人才获得所在市(州)“五一劳动奖章”,1名党政干部获得市“青年五四奖章”,37名干部人才获得G省第二届“最美劳动者”称号。这些荣誉是对个体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是精神方面的,这对缓解帮扶干部的身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表彰会通常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举行,而平

① 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② “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这里是指地方政府由于追求短期目标而不断地加大任务量,导致任务量无法降下来。

③ 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

日在较大压力下工作,帮扶干部容易出现身心健康问题,却缺乏有效的舒缓途径。如果有专业人员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进行心理调适,帮扶干部的身心疲惫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样的心理健康预防策略与调适手段在关爱政策里面还比较少。

第三,关爱重点以治疗为主,预防措施较少。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以“差序格局”为主的社会关系网中,中国人在感情上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度环境的约束,帮扶干部大多不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且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往往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实际上,面对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帮扶干部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但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的人寥寥无几。同时,情感上的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会让人处于耗竭状态,导致包括身体、心理、感情枯竭的体验^②。正是认清了这一点,已有关爱政策主要从治疗方面着手,通过治疗手段,如定期向心理专家汇报心理状况、开展专业治疗与调养等,去解决或缓解部分干部的心理问题。但是,由于干部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其身心健康风险长期积累的结果,通常发现问题时,干部身心健康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虽说治疗有一定的功效,但远不如预防的效果好,而现有的关爱政策却对此着墨不多,亟须加强。

综上,在乡村振兴阶段,帮扶干部在身心方面的压力有增无减,虽然关爱政策对帮扶干部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政策存在上述三方面不足,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在调查清楚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基础上,分析社会工作者介入情感支持的优势、路径与方向,具有重要的价值。

表2 关爱政策分析

关爱主体	所在单位、帮扶单位、工会、团委、妇联等	
关爱客体	帮扶干部个人	帮扶干部家庭
政策内容	1. 工资福利 2. 生活补贴(补助) 3. 购买保险 4. 探亲休假 5. 优先考虑提拔晋升 6. 思想建设 7. 慰问 8. 心理调适 9. 宣传表彰 ...	1. 送菜上门 2. 家居保洁 3. 长者照顾 4. 母婴服务 5. 课业辅导 6. 思想引领 7. 慰问 8. 心理援助 9. 宣传表彰 ...

四、社会工作介入帮扶干部情感支持的优势与策略

社会工作者可以为帮扶干部及其家庭提供适合的服务。作为以利他主义理念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专业助人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深,社会工作将深度嵌入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之中^③。社会工作者处理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是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且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利他主义。社会工作者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会从帮扶干部的立场出发,探寻他们的情感需求。这一点十分重要,一方面本着利他主义,站在帮扶干部的立场去探究他们的身心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② 理查德·K. 詹姆斯、伯尔·E. 吉利兰:《危机干预策略》(第七版),肖水源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534页。

③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问题,是做到有效倾听、抓住他们主要情感需求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本着利他主义,站在帮扶干部的立场是做到同感或共情的前提,这样能更好挖掘他们的情感需求。因此,社会工作者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是与帮扶干部顺利建立专业关系、筑牢服务基础的第一步。第二,专业知识。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包括了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作理论以及专业的技巧等,这些专业的知识让社会工作者在与帮扶干部的交流与互动中,时刻保持价值中立,不受帮扶干部情感的干扰且能够运用这些专业的知识去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例如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在遇到“两难”问题时,及时给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参考做法,让社会工作者保持良好的操守品行、专业才能,同时提供给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社会工作者与同事之间或者与其他专业实务者一套规范参考,以维护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或其他相关人士的和谐关系。因此,拥有专业的知识是社会工作者为帮扶干部提供情感支持的优势所在。第三,系统分析。社会工作者在满足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个人的情况,更要重视“人在情境中”与“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个人问题的产生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将帮扶干部的问题置于其所在的家庭、社区、群体、组织等外部环境中,做系统全面的分析,才能作出合理的、公正的评估与判断。这是系统分析方法的要求,也是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的保证。基于上述对社会工作介入帮扶干部情感支持的优势分析,那么,社会工作该如何利用这些优势介入帮扶干部情感支持中,从而满足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呢?

1983年,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首次提出了“情感劳动”一词,她认为情感劳动是在从事体力和心理劳动的过程中,需要情感的投入,这就要求一个人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①。由于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情感的投入是不可缺少的,在此过程中,服务对象的情感需求在社会工作者的情感互动中得到满足。由此可知,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体现着全过程的情感投入,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帮扶干部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达到情感支持的目的。为此,本文结合社会支持网络中情感慰藉、心理疏导与关系支持三方面内容,探索社会工作者在帮扶干部工作、生活、家庭三方面的情感支持介入方法。

首先,工作方面的情绪缓解。一是需要缓解帮扶干部工作上的情绪压力。社会工作者参与进来,协助帮扶干部思考除工作以外的事情,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安排,对被忽视的方面,如朋友、生活、家庭等方面重新进行情感注入或加深情感投入,强化关系支持,缓解情绪压力。二是做好晋升的压力调适。作为激励干部的手段之一,职位晋升带有一定的关爱色彩,但随之带来的压力也是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调适的。如果职位晋升后,出现与岗位所需能力不配的现象,会造成一些不适应,而大部分干部选择服从安排。一段时间后,不适应的情况会通过负面的情感表露出来,其实这是压抑自己真实情感的结果。此时,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干部抒发情感的窗口,倾听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做好心理疏导,同时收集他们的诉求,向组织部门反馈,让组织部门与干部进行对接,以解决他们的岗位适配问题。作为中间人,社会工作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更好地服务干部晋升压力的需求。三是协助帮扶干部应对考核的压力。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针对帮扶干部的考核压力进行及时疏导,倾听他们对工作的看法,收集他们对考核内容的意见;另一方面,将收集到的意见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促进考核内容的完善。

其次,生活方面的情感重视。由于帮扶干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帮扶工作中,往往忽视了生活上的情感需求。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重新唤醒帮扶干部对生活上的情感重视,具体而言:一是协助帮扶干部解决饮食和语言上的问题。尤其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帮扶干部与当地干部在情感交流上的障碍,社会工作者可对部分适应困难的帮扶干部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讲出困难所在;同时可通过开展如文化认识小组、语言学习小组、文化感受之旅等小组或社区活动,让帮扶干部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二是协助帮扶干部尽快适应当地生活。情感是一种投资,通过情感的交流,可以从他

^①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21页。

人那里得到有价值的自己缺乏且又需要的东西^①。在这部分,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开展过来人小组活动^②,邀请有经验的帮扶干部,让他们谈谈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是如何重视情感投入的,可以获得哪些情感产出,并在交流中得到情感的传递。同时还可以邀请专家开展有关社会适应的讲座,让专家“出诊”,解答帮扶干部的疑惑,实现情感慰藉。在小组活动或讲座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可采取问卷调查或单独访谈的方式,了解帮扶干部对这方面问题的认知。此外,社会工作者可每周安排固定时间,一方面与帮扶干部回顾其在生活上与他人所产生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肯定帮扶干部的转变,对其进行情感支持与认同,使之成为工作上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将帮扶干部组织起来,开展相应的分享小组活动,邀请帮扶干部以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分享每周与家人、朋友、同事等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在相互分享的过程中,有助于帮扶干部情感交流,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支持网络。

最后,家庭方面的情感回归。家庭是一个由彼此相爱、互相关心的人组成的情感群体,情感构成了家庭的基础资本,在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情感资本,从中可以获得情感回报,如身体健康、情感愉悦、生活幸福等^③。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重新唤醒帮扶干部在家庭方面的情感回归。首先,进行线上连线。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帮扶干部制定与家人的交流计划,促使帮扶干部经常给家里人打电话或视频通话,讲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家人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进行情感交流,做到情感的慰藉。其次,进行线下活动。家庭给帮扶干部产生的压力,往往是由对帮扶干部的工作、生活不理解造成的。因此,可将帮扶干部的家人组织起来,采取研学的形式,到帮扶干部的受扶地进行实地参观体验,让家人真切体会到帮扶干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在此过程中,帮扶干部及其家庭的情感得到抒发并加强。最后,开展家庭社会工作。帮扶干部后方稳定,才能让他们安心工作。此外,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如社工机构。帮扶干部原单位所在地的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可充当服务提供者、倡导者、支持者、陪伴者、资源整合者等角色,通过开展个案、小组、社区活动,使帮扶干部的家庭成员感受到被理解、信任与尊重,从而积极面对现实,摆脱困境。结合关爱政策的实施,社会工作者除了给帮扶干部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外,还可以为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定期的心理调适,倾听家庭成员的困难,并及时作出应对措施。也可以让帮扶干部的家庭成员组成互助小组,构建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应对如家人生病这样的突发情况,或者在互助小组里面进行情感抒发。由于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因此,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可以相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使其心理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此外,除了在工作、生活、家庭方面开展对应的社工服务,作为同行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与帮扶干部进行平等对话,容易在他们之间进行持续性的情感激励。首先,社会工作者与帮扶干部互动交流,也是情感的互动,里面充满了技巧,如接纳、尊重、个别化、保密、价值中立等,通过建立平等的专业关系,让情感能够顺利地传递与交流,比如表现为支持他们到受扶地挂职,尊重他们的选择,肯定他们为受扶地的发展作出的贡献,特别是收集并转达群众对他们的认可,让他们觉得有人在身旁默默支持着,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抚慰与充盈。其次,帮扶干部被安排在不同的受扶地区,但他们共同承担着历史重任,组成了时代的命运共同体,这由共同“命运”派生出的建立在共同的认同与归属之上的“我们感”,以及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休戚与共的道德密度,超越了个体视域的能力^④。正是基于这种命运共同体,社会工作者能迅速构建集体情感的互动氛围,如通过每月组织开展一次分享会、交流会、庆生会等,邀请同一地区的帮扶干部共同参与,从而让帮扶干部情感得到释放,心理得到满足,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同时增强集体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其强调任何人都只能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生存,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并通过为共同体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⑤。最后,帮扶

① 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52页。

② 过来人小组是指对某事曾经有过亲身经历和体验的人通过分享自己的事迹为他人提供参考经验而形成的小组。

③ 郭景萍:《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④ 周晓虹:《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

⑤ 张倩:《从家国情怀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干部个人与国家的情感互动,帮扶干部通过投身于国家事业中,参与或完成既定的国家历史任务,从而实现自身对国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烈国家情感作用下,帮扶干部通过实际行动来构筑“个人—国家”的情感链接。社会工作者可以对帮扶干部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开展以帮扶干部为主题的宣传周或宣传月,营造帮扶干部与国家情感的互动氛围,更好地体现帮扶干部的工作价值与意义,并增强帮扶干部个人与国家情感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情感对社会具有反哺作用,若将情感转化为社会资源,反哺社会,对帮扶干部的帮扶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毕竟,帮扶干部肩负着国家的历史任务,其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是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者通过情感互动,不断加深、固化情感,塑造稳定的历史使命情感,延续以“奉献、吃苦、实干、担当、大爱”为核心的脱贫攻坚精神,超越“身体之苦”实现“精神之花”的转变^①。此过程不仅使帮扶干部个人情感得到升华,更重要的是反映到帮扶这个大环境之中,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集中精神体现。当然,社会工作者虽然唤醒的是帮扶干部所忽视的情感,但正是这些情感的调节,为他们注入工作的热情,反过来增加了帮扶干部的工作动力。而且情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通过如“送温暖”“对口支援”等许多中国老百姓愿意看到的“民心工程”,构建政府与民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情感联结^②,这其中离不开干部大量的情感投入,亦是他们工作有效性的体现。因此,情感反哺于工作当中,促进着社会发展。此外,社会工作者组织帮扶干部开展互动交流,加深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间的情感,原来分散的个体先从思想上聚集起来,培育他们的共同情感或者集体情感,产生情感共鸣,促使帮扶干部团结在一起,最终形成集体行动。而处于集体行动中的人们情绪往往是高涨的,且投身于国家结对帮扶这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业中,这是物质难以企及的精神上的充盈。

综上,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情感慰藉、心理疏导、关系支持等手段,强化帮扶干部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并将情感资源调动起来,重新唤醒被忽视的情感,激发帮扶干部共同形成帮扶合力,助力共同富裕。同时,社会工作者从情感唤醒、情感激励、情感反哺的角度进行介入,对帮扶干部个人、家庭、社会中的情感及其关系进行调适,实际上是积极回应和满足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治理实践,是情感治理在社会工作中的微观体现。

五、研究反思与讨论

社会工作介入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不是机械式的指标任务体系,而是国家对干部的柔性关怀。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依赖于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对某类社会事件的关注程度,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后者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开展服务的平台。现实中,关爱政策范围较少涉及有关满足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内容,这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机遇。但反过来看,正因为关爱政策较少涉及情感需求方面的内容,才使得社会工作者找不到介入的路径。因此,这需要政府部门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开辟渠道,将满足帮扶干部情感需求的社工元素体现在关怀政策里面。

社会工作是衍生于欧美语境中的专业和职业,欧美人表达情感更多的是“张扬”和“我行我素”,而中国人表达情感更倾向于“内敛”和“不喜形于色”^③,在中国土壤生长的社会工作,是需要适应中国国情的,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同时,在政府层面需要其参与政策的倡导,在社会层面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在社区层面社会工作者要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行动指导、提供专业服务,在个

① 谢治菊、罗浩奇:《脱贫攻坚精神的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基于60个扶贫干部口述故事的文本分析》,《公共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③ 卫小将:《排异与契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局限性分析》,《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8期。

人层面则需要特别注重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那么,面向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及社工行动,建议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202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①2024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②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工作取得重要成就。可以说,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未来,可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的顶层设计,注重社会工作的长远发展,让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进一步增进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包括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其中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可以说,健全相关的关爱政策,是帮扶干部及其家庭获得正式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能够让他们直接获得情感支持。同时,在关爱政策内容中,除强调政府部门的职责外,更需要体现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等相关主体的作用,通过不同主体的力量为帮扶干部及其家庭提供情感支持服务,全方位进行关爱。此外,需站在帮扶干部的角度,制定适合帮扶干部的关爱政策,及时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同时,进一步健全帮扶干部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直接的情感支持缓解帮扶干部工作、生活、家庭方面的压力,增强帮扶干部之间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而提升其对帮扶工作的投入程度与帮扶成效。

第三,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以项目制的形式嵌入帮扶干部的情感支持当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着多重角色,如政策的实践者和评估者、帮扶干部的同行者和组织者、社会资源的整合者、集体行动平台的搭建者等,对政策实施、政策优化、干部情感支持等方面大有裨益。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能够预防并减少焦虑、抑郁、自杀等社会问题的发生,大大降低帮扶干部的心理风险,推动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深层次互动,从而提升个人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建议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体系、整合政策要素、完善政策内容,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与调适,让关爱对象从重个体到个体与家庭并重,关爱内容从重物质到物质与精神并重,关爱重点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倾斜,进而实现帮扶干部身体、心理、精神层面的健康。

简言之,情感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情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或效应,但这并不能否认情感具有自身的独立作用。就此而言,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③。帮扶干部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拉近“山海”情感距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帮扶干部关爱政策的设计上,需要更加注重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情感支持,通过社会工作网络,让帮扶干部及其家庭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同时,可利用社会工作这一桥梁,促进帮扶干部的情感认同与情感归属,从而形成集体行动。此外,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介入,让帮扶干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情感关系得到更好的调适,这是关爱政策里情感部分的有效补充,也是促使帮扶干部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大局的有效路径。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②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1版。

③ 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Emo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Workers' Actions for Assistance Cadres

Xie Zhiju¹ Liang Yinghua²

(1.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P.R.China;

2.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1370, P.R.China)

Abstract: Assistance cad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ancing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collaborated and common regional development, serving as critical agents in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ir contributions are instrumental in reduc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promoting equitabl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wever, these cadre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subjected to multifaceted pressures, which need attention and concern.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is not only critical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cadres but also for the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acy of their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broader national agend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which comprise four functional dimensions: material assistance, emotional comfor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relational support.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assistance cadres engaged in cross-regional assignments must navigate complex social adaptations, including physical,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ultural adjustments, thus, established a stro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s necessary. Theoretically, social support network theory highlights the embedding of social work into the emotional support of assistance cadres to alleviate their stress.

Drawing on qualitative data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motional needs of assistance cadr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personal, and familial. Professionally, cadres face significant stress due to the demanding nature of their works, the positioning of their special roles and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s. Personally, the need to adapt to unfamiliar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local culture further exacerbates their levels of stress. As for familial aspects, emotional burdens extend to their spouses and children, who must contend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maintaining cohesion amid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istance.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and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in meeting the emotional needs of assistance cadres. Social workers have certain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and propose specific operational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meeting emotional needs, it can facilitate a tripartite emotional interaction system centered on the individual-collective-national dynamic. Additionally, social workers can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feedback within the work, fostering a sense of shared or collective sentiment among cadre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ir motivation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national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paired assistance program.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targete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to deliver emotional support for assistance cadres. However, it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top-level design,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refining policy frameworks etc. . These measures enable social workers to better adjust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dre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capacity t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ensuring higher efficiency in re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Assistance cadres; Emotional support; Social workers' actions;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陆 影]